

以中等强国为支点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迫切性与可行性

丁 工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建设阶段，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心与重点不突出的问题。因此，为了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迫切需要解决可持续和提升效益比的问题，通过发挥中等强国作为战略支点的作用，能够起到“以点带面、由点及面”的辐射和带动效果，是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有效路径。该文从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两个维度考量，得出中等强国相比大国数量较多、分布广泛且大多处于海陆联结的枢纽位置，以及相比小国具有较强地区影响能力的特点。这些因素决定中等强国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承担起战略支点的角色。同时，该文根据“一带一路”五通布局方向并结合中等强国的战略支点定位，提出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构建区域科技中心和发展高地的角度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中等强国 “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 第三方市场合作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项目“中国周边战略”（项目编号：2017DFZDQQY0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周边外交战略”（项目编号：2020QQYB05）。

【作者简介】 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在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下，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重大进展。截至2023年1月6日，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由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大写意”向深耕细作、精雕细琢的“工笔画”阶段升级，需要精准定位与不同国家的关系，通过发挥个别国家战略支点的独特作用，把整体推进同重点突破

结合起来,构建一核引领、多元联动的雁阵集群合作结构。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支点作用的成功发挥建立在相关国家客观条件、主观意愿和实操可行性协同的基础上。总体上看,中等强国^①既拥有发挥战略支点作用的客观条件,又具有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承担积极角色的主观意愿,能够很好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开展。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从迫切性和可行性的角度考虑,应当充分发挥中等强国对邻近地域的集聚功能,构建产能转移和装备制造合作的区域发力点和放大器,在双边合作中合理运用示范国外溢效应,由中等强国入手,先行试点、渐次推展,逐步打开对象国合作市场,并在合作过程中分析、总结、提炼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规律性做法推介到相邻或周边区域国家,调动和激发邻近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

一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战略支点

2018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要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从理念到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全面开花、摊子铺大、战线拉长的问题,距离高质量发展目标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这些问题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可持续和效益比方面。第一,部分地区和共建国家存在政治经济发展不稳定、法制不健全、营商环境差等问题,导致“一带一路”正常的合作进程可能迟滞或被迫中断^②。例如,2022年11月,斯里兰卡爆发金融危机,货币大幅贬值,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证券交易所综合股指一夜暴跌74%,最后

^① 由于中等强国比一般国家更有能力撬动相关单元集合,同时又不像大国本身就是擘画地缘编成和力量结构的原位机体,中等强国承担战略支点作用的要义在于可以撬起比自身载荷更有重量的单元模块。因此,以中等强国为杠杆支点是中國外交对相关国家定位的一种运用和导向,而不是双边关系的状态解释和现象描述,是中国进行外交战略设计的观感认知和思路方法。在外交布局中将中等强国作为支点,主要基于对中等强国特性的发掘利用,进而达到提升中国外交资源利用率和集中度的效果,并不是需要以此与相关中等强国达成某种战略共识或形成双边关系机制。同时,从外交实践和日常交往看,中等强国事实上也希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支持它们在更广空间发挥影响。

^② 王晓泉:《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系》,《欧亚经济》2023年第2期。

偿债压力倍数放大导致国家宣布破产。尽管斯里兰卡国内动荡不会根本改变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总体趋势,但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合作的持续性。第二,从投入产出看,社会制度、法律规则、文化传统等多样性、差异化带来隔阂和沟通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交流与相互协作。例如,阿拉伯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成员国中已经有20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还签署了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宣言。然而,阿拉伯国家既有整体性、一元化的基因,也有多样化、差异性的特征。从政治体制看,包括多党制、两党制甚至无党制国家。从经济发展程度看,有的是较为富裕的产油国,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有的是长期战乱不断、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的动荡国,如伊拉克、巴勒斯坦;还有的则是依然身处战火之中的热点国,如叙利亚、也门、利比亚。阿拉伯民族虽然拥有共同语言、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寻求统一团结的愿望,但国家之间发展程度悬殊、内部矛盾复杂,这就要求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不能只注重阿拉伯国家的共性,还应该考虑各国集体意识中的个性需求,这样才能实现“一带一路”合作中低成本和高效益的最佳平衡。

可见,“一带一路”建设作为超级系统工程,将会面临不同国家经济、社会、法律等制度和政策各异的情况,会面临地缘政治博弈、地区宗教矛盾和安全冲突的风险挑战,以及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阻碍“一带一路”倡议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而且,就发展质量和规模体量而言,除部分主要大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只有通过协同若干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合作,才能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①。因此,进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阶段,考虑到参与合作的国家和区域组织数量比较多,已经不适宜继续采取大水漫灌式的分散用力,而应该实施精准滴灌式的集中用力,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评估和应变准备,综合统筹成本和收益。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宗教信仰相似的国家更容易形成统一立场,区域内交易成本和政策协调难度更低,邻近国家会在反复接触和互动过程中发现彼此立场的重合之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应该注重与中国合作愿望强烈、基础条件较好、产业契合度高的国家的战略支点作用,尝试以这些条件比较成熟的“点”为样本进行摸底探路、优先建设,随后实施品牌效应,再向有广泛共识的“面”上大力推广,这样既能够形成点、线、面三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格局,还可以增强和

^① 钟飞腾:《“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

优化“一带一路”合作的要素、资源和效率。同时,由于地理范围已经远超既定的境域空间,作为新型区域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特别需要多个战略支点的协同作用。

所谓支点原本是物理学中的名词,指杠杆发生作用时起支撑作用固定不动的点,在地缘学中常被引申为能使相关单元或集合围绕固定点转动的关键、中心因素。战略支点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麦金德提出,他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和有限机动能力的一片区域界定为战略支点^①。战略支点指在泛区域、次区域、跨区域或全球的多边合作框架内,通过战略性的双边互动和交流合作,有效发挥全局或关键支撑作用,并对多边合作中其他各方产生示范、突破、引领、带动和激励作用的国际行为体^②。概括来说,战略支点国与地缘重心国一样具有以下特征:居于战略要冲和地缘区域的重心位置;拥有较多的人口、较大的经济体量或者国土面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综合实力较为强大,进入适合本国现实环境的稳定发展状态,能够塑造有限的规则、制度和做事方式;周边分布着一些较小的国家,对邻近相对弱小国家具备持久的地缘影响和战略意义^③。同时,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支点国家而言,最关键的是要保持与中国和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避免在负面因素影响下出现波动甚至倒退,否则就很难为双边战略合作提供有效和持续的支撑作用。从权力结构互补性、表面征状导向性和政策工具可行性三个向度考虑,“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支点国家应该是能力匹配者、关系良好者和操作可行者。从实力角度出发,只有大国、中等强国具备成为战略支点的条件。但大国参与合作的意愿不高,而许多中小国家虽然合作意愿较高,却由于实力条件有限也不适合扮演战略支点的角色^④。综合权衡,中等强国无疑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阶段战略支点国家的理想选择。

二 中等强国的主要特点及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等强国是一种特定的国家类型,虽然总体战略条件和综合实力有限,

①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0~61页。

② 周方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的几点看法》,《新视野》2015年第2期。

③ 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

④ 丁工:《地区大国或可促进“一带一路”五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8日。

不具备比拼全能大国的客观条件,却也拥有远超广大中小国家的禀赋要素和相对雄厚的综合国力,尤其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具有腹地市场广阔、人力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的比较优势,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公共安全和过程治理产品^①。在中等强国的行列中,既有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波兰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韩国、墨西哥、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还有埃及、伊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归结起来能够发现,中等强国既强又弱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明显,具有权力集聚与离散对立统一的属性,而这实际上也是它们能够避免对位竞争和进行错位合作的重大优势。因此,选择中等强国作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与中等强国毕竟不是一个量级的行为体,双方之间并不构成对位竞争关系,这决定中等强国在体系结构层面存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性。

生物科学研究发现,很多时候物种内竞争比种群之间竞争更加激烈,原因是同一物种生存依赖相同的食物和环境,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零和竞争关系;而不同物种生存所需的食物和环境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多数时候不会形成竞争或者零和竞争的关系。生态位原理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会遵循生态位原理的运行规律。从世界政治角度讲,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的等级结构社会,该结构可以与自然界中的生态位原理相比拟。以此推理,国际体系中处于等阶对位结构的国家具有相似的行为趋向,更容易诱发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大国和中等强国对待中国发展的态度上。

尽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既不谋求任何地缘政治目标,也从来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盘算,而是旨在通过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促进世界各国经济优势互补和互惠增长^②。但某些大国对其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怀疑、犹豫、迟疑甚至是敌意,部分媒体还时常针对“一带一路”制造噪音^③。例如,美国、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始终抱有高度警惕心理,美国想方设法进行

^① Bruce Gilley, Conclusion: Delusions of Grandeur in the Goldilocks Z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71, No. 4, 2016, pp. 651 – 658.

^② 陈新、杨成玉:《中欧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基于28个制造业部门的实证分析》,《欧亚经济》2020年第4期。

^③ 韩佳:《“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新发展》,辽宁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围堵与牵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明确反对的态度。印度一直试图在南亚扮演主导国角色,对“一带一路”持强烈排斥和抵制的立场^①。俄罗斯也一度质疑“一带一路”的意图和动机,其国内围绕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各方观点持续交锋。因为2014年乌克兰危机遭受西方制裁才选择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并于2015年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盟”对接的联合声明。

相比之下,中等强国对共建“一带一路”热情高涨、愿望强烈,多国还出台对接“一带一路”的政策文件(见表1)。土耳其是第一批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也是最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之一。土耳其希望发挥其横跨亚欧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的作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计划深度对接。2017年3月,主要由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中等强国创建推动的经济合作组织(ECO)在第十三次峰会后发布《伊斯兰堡宣言》表示,欢迎中巴经济走廊对地区整体发展和安全稳定所起到的“催化剂”和“减压阀”作用。西班牙希望“一带一路”倡议与本国的“地中海走廊”建设对接。埃及愿“一带一路”倡议与本国的“2030年愿景”和“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等发展战略对接。巴基斯坦专门成立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中国同哈萨克斯坦首创一揽子产能合作新模式,确定45个早期收获项目,总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堪称货物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范例^②。2018年11月,在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12个主办国中,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南非、埃及、加拿大、墨西哥等6个中等强国。2018年12月,中国和阿根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中阿合作注入动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扩展至“一带一路”倡议,双方同意推动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相关项目合作。

表1 中等强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相关合作情况概览

序号	国别	签署文件	伙伴关系	合作机制	亚投行定位
1	韩国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韩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联合工作组	意向创始国
2	南非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 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	意向创始国

① 王秋彬:《“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大国因素》,《理论视野》2016年第11期。

② 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续表 1)

序号	国别	签署文件	伙伴关系	合作机制	亚投行定位
3	波兰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	意向创始国
4	埃及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	意向创始国
5	伊朗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伊外长年度会晤；文明古国论坛部长级会议	意向创始国
6	西班牙	《关于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西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	意向创始国
7	土耳其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战略合作关系	中土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	意向创始国
8	墨西哥	《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纲要》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墨政府间两国常设委员会；中拉合作论坛	尚未加入
9	阿根廷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和《中阿政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3)》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阿政府间常设委员会；中拉合作论坛	正式会员国
10	意大利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	意向创始国
11	加拿大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	战略伙伴关系	中加总理年度对话	正式会员国
12	巴基斯坦	《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	意向创始国

(续表 1)

序号	国别	签署文件	伙伴关系	合作机制	亚投行定位
13	澳大利亚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意向创始国
14	尼日利亚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战略伙伴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	意向创始国
15	印度尼西亚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和《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海洋支点”谅解备忘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合作联委会	意向创始国
16	沙特阿拉伯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和《加强“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 中阿合作论坛	意向创始国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大国对位性竞争的结构决定其他大国对待中国实力和身份变化更倾向于持有所保留的态度。作为新兴大国群体里的佼佼者,中国国际权力的扩大必然意味着某些发达国家的权力相应缩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他新兴大国的权力份额^①。而中等强国和大国在等级体系中不是相同的位阶等次,不会出现对位竞争与零和博弈的情况,此种本征属性决定了中等强国同大国更容易实现包容性竞争和梯次性博弈,能够建立强弱搭配、梯度相间的更为持久牢固的错位合作关系。因此,中国作为大国在本质上与中等强国不是对位关系,不会构成结构性矛盾,即使有分歧和矛盾也属于局部议题,而不是像与大国那样形成体系结构上的对冲博弈,从而决定中等强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① 王在邦:《试论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

第二,中等强国是除大国外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相比一般中小国家具有良好的先天优势、要素禀赋和客观条件,同中国进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结构耦合性更高。

大国是全球格局体系中的“头部”国家,中等强国则是等级结构体系中的“颈部”国家。中等强国虽然辨识度和显示度相比大国偏低,在相当意义上是大国政治的附属品和伴生物,在推动国际体系演变上也不具有比肩和匹敌大国的实力与地位,更不能像大国那样在国际体系变迁中起到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但中等强国是在除大国外综合实力排序最靠前的群体,是区域一体化的龙头和支柱,具有不可忽视的导向性、关联性作用。纵向梳理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历史轨迹发现,大国掌握着全球秩序转换和国际体系变更主动权,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体系中战争与和平的形态,世界是两极化还是多极化趋势由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决定。但在大国权力政治的因果关系之外,国际秩序演化还同中等强国的变动构成因果关系,包含着中等强国参与力度和介入深度强化和助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逻辑^①。特别是中等强国在有限区域内具有权力集中度更高的不对称优势,实施战略自主外交的意愿更为积极和强烈,能够影响和带动邻近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超越国家界线的超级区域中心的作用。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技术创新加速突破、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产业形态、社会分工和组织方式出现代际级差。目前,中国在光电信息、工程技术、生物医药、跨境电商、传媒通信、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等领域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尽管同极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尚存在一定差距,但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比却拥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尤其是相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质量实质上已完成从追赶超越型向主导引领型的升级换代,从而导致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出现结构性产能过盈和需求冗余并存的情况。中等强国与中国的发展梯度和产业代际落差较小,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适用性和契合度更高。因此,双方经贸和产能对接合作不会存在“断崖式”的结构性代际落差,经济结构的梯次性决定双方更容易形成错位分工和互补优势。同时,中国产品具有较高技术水准,相比西方大国同类产品价格更为便宜,并且贴近基层实际,符合民生

^① Bruce Gilley and Andrew O'Neil, eds., *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

需求,与中等强国适销对路,使得中等强国更容易成为中国中高档产品外销的主要客户和对象群体^①。

三 中等强国与“一带一路” “五通”布局的合作路径和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加快沿线国家和相关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其核心与重点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共生的五个子系统。因此,“五通”布局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内容,无疑是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支点(见表2)推动高质量合作优先考虑的方向。

表2 中等强国在“一带一路”“五通”布局合作中的战略支点效应

国别	参会外宾 行政级别 (年份)	地理要冲、交通枢纽 或相应基础设施对接	双边贸易 额(亿美元) (对华排名)	人民币 结算	文明属性
韩国	国会副 议长(2017)	—	3 600.0(1-2)	是	儒家思想
南非	部务官员 (2017)	好望角航线	543.5(1-1)	是	混合
波兰	总理(2017)	欧洲“十字路口”; 可持续发展计划	421.3(2-1)	否	基督教
埃及	总统(2019)	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 苏伊士运河	202.9(2-4)	是	伊斯兰教
伊朗	财经部长 (2017)	霍尔木兹海峡	147.8(1-4)	是	伊斯兰教
西班牙	总理(2017)	直布罗陀海峡(休达); 欧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	471.4(6-5)	否	基督教
土耳其	总统(2017)	博斯普鲁斯海峡; 达达尼尔海峡; “中间走廊”计划	342.3(2-3)	是	伊斯兰教
墨西哥	部级官员 (2017)	—	999.4(2-2)	否	基督教

① 丁工:《“一带一路”上中等强国的独特作用》,《理论视野》2017年第10期。

(续表2)

国别	参会外宾行政级别(年份)	地理要冲、交通枢纽或相应基础设施对接	双边贸易额(亿美元)(对华排名)	人民币结算	文明属性
阿根廷	总统(2017)	—	178.3(2-4)	是	基督教
意大利	总理(2017)	北方港口建设计划	739.5(4-3)	否	基督教
加拿大	部务次官(2017)	—	916.4(2-2)	是	基督教
巴基斯坦	总理(2017)	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交汇点	278.2(1-2)	是	伊斯兰教
澳大利亚	—	—	2 209.0(1-1)	是	基督教
哈萨克斯坦	总统(2017)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	252.5(1-1)	是	伊斯兰教
印度尼西亚	总统(2017)	“全球海洋支点”构想; 区域综合经济走廊	1 243.4(1-1)	是	伊斯兰教
沙特阿拉伯	能源部长(2017)	“2030 愿景”框架	873.1(1-1)	是	伊斯兰教

注:此表分别选取相关中等强国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能否起到地理要冲或者交通枢纽角色、贸易关系、人民币结算和文明属性作为衡量指标,描述、分析和解释中等强国在“一带一路”“五通”布局中可行的合作路径。其中,双边贸易额为2021年数据,括号排名表示中国在对方贸易伙伴国中的排名和对方在该地区的中国贸易伙伴国中的排名。例如,表中沙特阿拉伯一项873.1(1-1)指2021年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贸易额为873.1亿美元,(1-1)中前1表示中国是沙特阿拉伯第一大贸易伙伴,后1表示沙特阿拉伯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理,表中意大利一项739.5(4-3)是指2021年中国和意大利贸易额为739.5亿美元,(4-3)中前4表示中国是意大利第四大贸易伙伴,后3表示意大利是中国在西欧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 在政策沟通中发挥中等强国更具地缘综合力和政治关联度的优势

中等强国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承载者。作为深入推进国际力量均衡化、国际秩序合理化的关键力量,以中等强国为主干的区域性多边组织影响力不断增大,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中等强国是区域性多边合作机制的驱动力和稳定器,以其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强大辐射力与凝聚力对周边区域同属一个文化谱系的国家具有异乎寻常的引领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民众的认知偏好、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一带一路”国家价值理念、社会制度和发展状态存在较大差异,以中等强国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先导者,再逐步推进到相关邻近国家,能够有效减少同更多国家沟通的政策成本和协调难度。

(二)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中发挥中等强国地缘区域的枢纽和轮轴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和先导要素,也是世界各国经济联通和交往的客观要求。“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之一是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捷的交通又是促进区域产业深度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2017年5月,在中国“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互联互通有助于打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对增强各国发展动力、改善民众福祉具有重要意义。”^①从地理区位角度看,中等强国大多占据战略通道或者交通枢纽之地,具备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对周边区域有很强的传导力和扩散性。因此,以中等强国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集散地和枢纽港,构建包括内河水道、公路、铁路、港口和管道等在内的陆、海、空以及网络交互操作、相互兼容和多式联运的综合立体联通体系,形成多种设施类型融合汇聚的复合型联通格局,既能达到区域性基础设施的最佳配置和最高收益,还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全球化设施联通布局。

例如,波兰位于欧洲中部,是连接俄罗斯与欧盟的重要通道^②。作为推动“一带一路”与欧盟对接的重要节点,波兰在东欧界域中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价值非常明显。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发挥波兰联通东西欧的重要作用,推动物流配送中心和仓储基地建设,加快完善以波兰为中心的跨境电商区域营销网络,能够产生“以点带面、由点及片”的辐射效能。

(三) 中等强国基本上维持着一套相对成熟、多点联动的区域贸易网络

从国际经济合作角度看,无论是促进产业链向下游延伸,还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或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般都需要转化为贸易和投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战略,而且是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更是软件(秩序)与硬件(商品)的高度结合,不仅需要港口码头、市政路桥和信息通信等硬件设施联通,也需要在规则衔接、教育培训、劳动力、通

^①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闭幕辞》, <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n100/2017/0515/c24-416.html>

^② 朱晓中:《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因素:利益格局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0年第4期。

关手续等软件领域合作。因此,贸易畅通的内涵不仅表现为贸易增长与投资增加,而且深入到机制保障、纠纷解决和风险防范等诸多方面。中等强国在邻近区域扮演着经贸、技术和投资合作的“领头羊”角色,中国与中等强国就直接投资的行业标准、技术和规范加强对接,可降低进出口环节的制度性成本,进而助益经济体系形成内生型与外向型兼容互益的格局。中国加强与中等强国在共建商贸物流示范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方面的磋商合作,能够提升“一带一路”建设中与相关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与中等强国共建自由贸易区、简化海关手续还有利于促进良性互动,避免恶性竞争,降低双边和地区贸易环节的制度性成本和物流成本,减少隐性壁垒,促进跨区域贸易畅通。

(四) 中等强国可以承担资金融通的区域中心职能

跨境金融合作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润滑剂和助推器,决定着经济运行、跨国合作、对外交流的血脉和经络能否畅通。从现实情况看,资金融通合作既需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和资本金约束,也需要充分考虑国家的总体债务承受能力。中等强国基本建立起稳定的股票市场、货币信用和资本交易体系,在周边国家拥有成熟的金融服务网络,能够部分承担区域金融服务和人民币清算中心的职能。中国与中等强国通过共同投资、相互持股等形式开展资本项目合作,构建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多层次融资体系,加强双边货币互换以降低单一币种带来的汇率风险,既能以中等强国为平台给周边国家提供融资支持,又能助益“一带一路”实现金融服务、贸易投资的区域性延伸和拓展。例如,沙特阿拉伯是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金融强国,国内多家银行在中东和阿拉伯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和业务网点。中国各大银行可以率先在该国建立分支机构,并推动沙特国家银行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促进区域性贸易合作的自由化、便利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五) 中等强国能够在民心相通中发挥集聚和扩散相益的导向功能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而且是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人文交流、公共外交空间内,个人和社会的能量均能得到充分释放,从精英人士到普通民众都可能成为国家形象的塑造者和推广者。由于“一带一路”跨越中华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等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信众的汇集地和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为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和平台^①。随着不同文明之间交

^① 孙壮志:《“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人文合作:成就与前景》,《欧亚经济》2023年第2期。

流的深入,“一带一路”建设所带动的人员流动和民心相通必然会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既将形成区域共同价值观,也将产生文化的差异和利益的冲突^①。因此,在充分发挥政府外交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的同时,鼓励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文化旅游和智库交流的方式来促进民心相通,充实丰厚社会外交的政策工具和导向维度,涵养、形塑沿线相关国家的政情人士和社会舆论,增进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好感兴趣和正确看法^②。这样既能够避免成为部分外国媒体跟风热炒的话题和谈资,也是反击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以及各种反华排华情绪和“辱华”言论的有力武器^③。而且,中等强国群体几乎涵盖人类世界的不同地区、种族、宗教和文明,文明形态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三大谱系类型以及拉美混合型亚文化圈。因此,中等强国带有广域离散性和局部聚合性共生的特点,对增进“一带一路”各界对华友好人士之间的相互了解及彼此友谊具有带动和引领功能。

四 以中等强国为支点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措施

根据上文分析,中等强国比大国具有更高的合作意愿,比中小国家具有更强的综合承载和辐射带动能力,能够承担“一带一路”新型区域合作中的战略支点角色。鉴于此,在具体操作问题上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 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支点构建区域发展高地和科技创新中心

新型区域合作尽管不再限定于某个单一地缘区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距离因素对政治经济整合的效用下降。实际上,国家对外影响力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呈现边际递减效应,邻近关系仍然是区域合作的初始动力和首要推力。现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最直接和关键的基础要素就是以科技发展为先导的经济力。以科技变革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导向和高效实践。中国积累的大量科技成果和先进管理经

① 夏立平:《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文汇报》2015年3月28日。

② 丁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深化中缅“胞波”情谊》,《社会主义论坛》2020年第5期。

③ 刘佳欢:《中、美、俄、新、澳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新闻话语生态性比较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22年博士学位论文。

验可以有效输出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于这些国家的市场开发,从而带动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民生发展。由于中等强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整体上处于较高层次,以中等强国为“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的区域中心和创新高地,既可以加快中国科研产业孵化标准在海外推广应用,也能够促进中等强国连带区域内相关国家高新科技的引进。

例如,波兰虽然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相比西欧国家较为落后,但其整体科技实力却处于中东欧地区“领头羊”位置^①。因此,可以考虑将“一带一路”中东欧地区技术转移协作中心设在波兰,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专门设立“一带一路”技术转移综合协调处,负责统一联系中东欧16国关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合作事宜。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一方面,中国与波兰之间科技实力差距不是特别悬殊,两国共建联合实验室和共同开发技术资源工作的对接难度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波兰与相邻地区国家有相关项目的合作经历,以波兰作为率先突破的地区支点能够增进中国同该地区各国的政策协同效应。这样既能帮助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的中东欧地区实现跨越,也为未来深耕欧洲市场、探索联合技术攻关积累经验。

事实上,国内一些高新科技企业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将地区总部设在中等强国。例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就将中东欧、北欧26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总部设立在波兰首都华沙,该公司还考虑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作为中东地区总部所在地。

(二) 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支点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

在世界经济发展失衡与中国经济地位显著提升的背景下,2015年中国政府首创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国际合作新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开放包容、务实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既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因此,该倡议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普遍欢迎^②。一个国家在特定范围内支持与其他国家双边合作的水平和力度,以及这种合作给其他行为体带来有利影响的程度,是决定第三方市场合作凝聚力和包容性的核心要素。因此,相关参与方能否较好地协调资源整合、渠道共享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供给和需求对第三方市场合作至关重要。作为等级位次较高、能量较强的区域合作中心,中等强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地,具

^① 姜建清、张超:《“一带一路”区域支点:中东欧践行》,《财经》2017年第27期。

^② 郑春荣:《中欧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知识》2020年第3期。

有生产集中、分工细密、行业 and 部门比较齐全的特点,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复杂分工体系。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支点进行片区化、地域化的针对性合作,通过发挥中等强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的排头兵、驱动器、示范区作用,以及资源整合、规模聚集和生产要素市场调配方面的相对优势,创建中国主导、中等强国牵引、区域和相关国家跟进的合作格局,既能够聚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属地特色,减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恶性摩擦和同质竞争,又可以确保中国、中等强国和项目所在国能够全面参与上下游产业链、价值链的建设,从而形成批次推进、模块轮动的多赢、共赢局面,实现向第三方市场延伸、向全部项目参与方覆盖、向构筑整套产业链和价值链倾斜的目标,达到推进资源整合、优化要素配置的最佳效果,真正使“一带一路”建设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初衷相统一。

例如,2016年1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中国银行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支持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从中国采购光伏设备,共同开发拉丁美洲等第三方市场。根据协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择优选取中资和外资银行共同参与该光伏项目,包括支持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和中国银行给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0亿美元的授信额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一系列融资解决方案。在各方的通力配合下,该项目不仅推动融资贷款和债券承销与同业金融机构专项合作,获得了极具竞争力的融资价格和信用保险服务,而且实现了长达15年的汇率掉期安排,获得了业主方和金融同业的高度认可。目前,部分项目已并网发电,为当地居民提供持续的清洁能源。此次签约堪称中国联合中等强国整合金融资源、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良好范例,不仅助力海外企业使用“中国制造”拓展第三方市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服务行业的交互融合,而且中外各类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联合融资,推动第三方市场融资合作形成产业生态的系统创新和集群效应,极大地缓解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时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小 结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推动国际合作、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重在通过装备制造和产能合作促进沿线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工业生产水平,串联并整合散布于各国和地区的资源要素,最终实现沿线各国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的目标,对共建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发

展、社会治理的支撑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一带一路”建设在遵照和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积极推动和扎实促进与沿线各国发展规划、技术标准的相融对接,将牵引带动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为目标导向,力图使之成为推进国际社会共商发展、同谋合作的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从理念到行动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全面开花、摊子铺大、战线拉长、重心与重点不突出的问题,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可见,在“一带一路”建设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跨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需要采取既分层次、又讲重点的策略,通过串珠成链、聚点成线的方式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从而带动“一带一路”建设水平整体跃升。

中等强国一般在邻近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力,具备边际产业转移需求的市场空间和发展腹地,能够形成产业合作的区域集成效应,起到先导、预热、纠错、缓冲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本质上与中等强国不是对位关系,不会形成结构性矛盾,即使有分歧和矛盾也属于局部议题性质,而不是同大国那样形成体系结构上的对冲博弈。中等强国实力增强后倾向于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开始寻求加强自身开拓性和创新性的领导地位。这也给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同中等强国发展合作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运作机遇。

因此,基于对中等强国在区域合作中“磁极”效应的发掘和利用、中等强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较高、与中等强国合作过程中引发地缘政治紧张或过度竞争的可能性较低等多重因素的考虑,可以尝试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支点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综合分析,以中等强国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具备高度可行性和适用性,中国能够通过发展与中等强国的双边关系撬动与其他区域关联国家的互动走向,在“一带一路”建设从宏观层面形势和战略的综合分析到中端层面具体施政的精确设计,再到微观层面战术级别的沟通磋商和贯彻落实,对其他国家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并且,随着中等强国对国际政治重要性的日益上升,充分发挥其战略支点的作用也能够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的质量和效益。

(责任编辑:徐向梅)

a ser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imed at enhancing employment, filling the gap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mproving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and helping poor people and implementing social assistance measures and the poverty problem has been ameliorated. In addition, Uzbekistan is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joining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to fulfill its national aspir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efforts have attained laudable progress.

Key words: Uzbekistan, poverty, social security, strateg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Meng Tianqi Liu Yuxiu Zhang Zhengmao China-Kazakh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has enormous potential owing to growing consensus and mutual demands. In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a mechanism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both countries for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agricultural trade volume are still insufficient, while the invest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ervice in agriculture still to be developed. This paper presents major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Kazakh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proposes a pattern for future cooper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China, Kazakhst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park

Ding Gong The unhighlighted focus of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phas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quires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nhancement in economic benefits. Hence it is advisable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medium-sized countries as strategic pivots to fulfill a radiation and leading effect. Considering subjective will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medium-sized countries to serve the role of strategic pivots. Meanwhile,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rough joint efforts such as implementing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creating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s and highlands, etc., based on the five-connection arrangements along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the role of medium-sized countries as strategic pivots.

Key words: medium-sized powers, "the Belt and Road", interconnectivity,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Zhu Yan Wang Shuchun The massive arctic strategies promulgated by Russia in recent years manifest the Russia's strong determination of arctic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weaknesses in location compared with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njoys special advantages in high level of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more developed economic hinterland, a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transport system and an industrial base to be involved in Arctic affairs, powerful R&D and innovation abilities, and the attain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Arctic development. Hence it is advisable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Ice Silk Road and to implement it from three aspects, i. e., water transport, energy industrial chai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Arctic, China-Russian cooperation, "the Ice Silk Road"